

试谈“牌记”产生的年代

王 若

牌记，也称书牌子，是我国古籍印刷中记录刻书者姓名、堂号、刊刻年代的一种标志，一般刻在目录、凡例之后，也有的刻在书的卷末。牌记的发展直接影响了书名页的产生，可以说牌记作为书名页的基础，是从手抄过渡到印刷时代最显著的进步之一。但我国古籍印刷中的牌记究竟产生于何时，学术界的意见尚不统一。有的著作把牌记产生的时间定在宋代，这显然不够确切。下面我们尝试对牌记的产生和发展作一简述，希望得到专家的教正。

在我国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前，书籍主要是靠人工抄写进行传播和保存的。有的是政府组织人来抄写，有的是书的主人自己抄写，也有的是花钱雇人抄写。自南北朝之后，抄书之风盛行。尤其到了唐代，文化得到了高度发展，抄书之风更加盛行。据《新唐书·经籍志》记载：“玄宗时，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等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两都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在政府的提倡、影响下，私人抄书之风也更加普遍。这时社会上还出现了一些以抄书为职业的人。由于他们主要抄写佛经，所以人们称之为“经生”。据《旧唐书·王绍客传》记载：

“江都人王绍客，遍览经史，尤工草隶，家贫，常佣力写佛经以自给，每月自支钱足即止。”当然，一些寺庙的和尚也是经卷抄写的主要人员。对一个抄写经卷的人来说，抄写一部长长的经卷

是件十分艰苦费力的事，但为了生活，又不得不忍受其辛苦。因此，当抄完一部经卷之后，很多人都情不自禁地在经卷上顺手写下自己劳作后的心情。由于抄写者的成分比较复杂，他们表达心情的文字也不尽相同。我们从敦煌保存下来的唐人写经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比如敦煌写本斯0692号卷子抄写者金光明寺学仕郎安友盛抄完经卷后，在卷子背后写了这样一首打油诗：“今日写书了，合有五斗米，高代不可得，还是自身灾。”抒写了他对收入不高的不满情绪。又如伯2643号卷子末题：“乾元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义学生王老子写了，故记之也。（参见赵振铎《古代文献知识》）。虽然语言戏谑不雅，但也表达了抄完一卷书后的心情。再如《维摩碎金》卷后有“灵州龙兴寺讲经沙门匡胤记”，“被原宗坚来，尤泥累日，写尽文书，缘是僧家，不欲奉阻”，“朔方释客派”几行文字（见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集》下册）。字里行间，也是牢骚满腹。有的不发牢骚，只记下抄写时间，地点和抄写时的情况，如《破魔变文》，后题：“破魔变文一卷，天福九年甲辰祀黄钟之月冀生十叶冷凝呵笔而写记。居净土寺释门津律沙门愿荣写。”也有的仅仅记下时间和书写者，如《龛山远公话变文》后题“开宝五年张长继书”。《父母恩重经讲经文》后题：“天成二年八月七日一坐书”。等等。从这些卷子的尾题来看，大多记上了抄写者姓名，抄写时间及抄写地点等，基本上包含了“牌记”中的内容，具备了牌记的主要特征。那么是否可以说雕版印刷出现后书中的牌记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呢？答案是肯定的。就以唐人写经尾题而论，也不是唐人首创，在唐以前就已出现了。如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写经新0672号《大广方佛华严经卷第八》尾题写：“延昌二年岁次癸巳四月十七日敦煌镇官经生令狐礼太写经说，竟用纸二十四张，典经师令狐崇哲枝经道人”（见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编《敦煌劫余录续编》）。这是北魏时期的产物，比唐人写经要早一百多年。正

是因为写经的尾题有如此漫长的历史，所以受其启发和影响，在雕版印刷术产生之后，才有可能很快出现“牌记”。也就是把抄写者改作刻书者而已。这个变化看似简单，但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今天看到最早的一部雕版书是刻于唐代的《金刚经》，其卷末镌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晋造普施。”这可以说是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带有牌记的雕版书了，虽说它只是为“普施”而刻，但却明确地记下了刻书者的名字，反映了刻书者一定的“版权”意识。这与“唐人写经”尾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应该说雕版印刷中的牌记，正是受“唐人写经”尾题的影响而产生的。另外，前些年四川成都唐墓中发现的成都卞家刻印的梵文《陀罗尼经咒》卷首镌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陀罗尼经咒本”一行牌记。这都足以说明了唐代有了雕版印书也便有了牌记，也足以证明了“唐人写经”尾题与牌记的渊源关系，同时也表明唐代的书商已普遍地使用牌记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卞家刻书已经把牌记刻在了卷首，这对宋代以后牌记的位置（有的置于书末，有的放在卷首）及书名页的产生，是有着重要影响的。书商把牌记放到了如此显著的位置，表明他已具有了较明确的版权和广告意识。

到了宋代，我国雕版印刷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牌记的内容和形式也更趋完善了。不同的书商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来设计牌记的内容，有的不仅刻有年代、书商的堂号室名，而且还刻有其它广告性的文字说明。如宋绍兴二十二年临安府荣六郎家刻本《抱朴子》一书，在卷二十后刻有一块七十五字的牌记：“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六月旦日。”牌记中详细地介绍了书铺的地址，印刷取自何本为底本，对如何精校也作

了说明，是一则很好的售书广告。又如宋刊《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卷末牌记为：“谨依监本写作大字，附以释文，三复校正刊行，如履通衢，了无窒碍处，诚可嘉矣。兼列图表如卷首，迹夫唐、虞、三代之本末源流。虽千载之久，豁然如一日矣。其明经之指南欤？以是衍传，愿垂清鉴。淳熙柔兆涪滩中夏初吉，闽山阮仲猷种德堂刊”（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这则牌记同上边一样，不仅介绍了刻书者、刻书时代，也介绍了所取底本以及如何精校，甚至还情不自禁地自夸其书“诚可嘉矣”，充分地表现了刻书者的版权意识和强烈的广告意识。

到了明清以后，牌记的使用更加普遍，除了文字说明之外，不少牌记还在文字的四周刻上了精美的图案。如明正德十一年陈世瑛存德堂复刻元本《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一书，其牌记的图案是上覆荷叶下托莲花的幡幢市招形，中间刻有“正德辛未晦月”六字。此外，还有的牌记边匡图案刻成长方形、炉形、亚字形、钟形、爵形、鬲形等等。

以上我们对牌记的产生和发展作了简要的描述，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牌记是产生于唐代而不是宋代，它是在“唐人写经”尾题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作者工作单位：大连市图书馆

（本文责任编辑：耿素丽）